



观察家丛书第1辑

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

许知远 / 主编

观念的冒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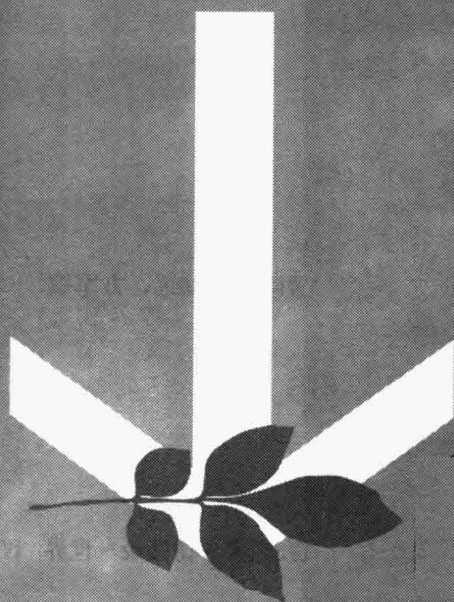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观察家丛书第1辑

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

许知远 / 主编

观念的冒险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本书是《观察家丛书》第1辑中的一本，收录了2002年《经济观察报》“全球视角”栏目下对世界杰出人物的访谈，内容包括有重思中国经济、管理的概念、世界趋势观察等。我们希望藉此平台，鼓舞起你内心对世界的广泛的兴趣。

本书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观念的冒险 / 许知远、方军编.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3.1

(观察家丛书)

ISBN 7-111-11349-7

I. 公… II. ①许… ②方… III. 名人—访谈录—世界 IV. D812.5

✓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98651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责任编辑: 吴雄江

山东高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0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787mm×1092mm 1/16·12.5印张

定价: 25.00元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总 序

重建公共知识分子传统

许知远

“（他们是）倒卖观念的职业好手”，哈耶克是20世纪最有力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抨击者之一，尽管他在后半生成为该行列中最著名的一员。记者、教师与媒体代表，这些经典的公共知识分子类型，在顽固的哈耶克眼中，就是那些“在有了些道听途说的科学知识以后，便自封为现代思想的代表……肩负着向公众提供新观念责任的人。”在战后那场席卷世界的集体主义潮流中，势单力薄的哈耶克发现这些一知半解的公共知识分子占据着舆论的中心，做出煞有介事却漏洞百出的判断，在整个20世纪30~40年代那么多杰出的知识分子醉心于斯大林的改革与凯恩斯的方案。

在这种意义上，理查德·波斯纳，美国杰出的联邦法官、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不可置信的高产作家是哈耶克的继承者。在2002年出版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书中，他继续鄙夷这些倒卖观念的职业好手。他坚持，专家不应该超越自己的专业发表言论，而那些依靠媒体与出版业生存的所谓知识分子则沦为市场的奴隶，他们的工作质量不敢恭维。他举例说，那些广泛谈论微软反垄断案的“媒体权威(pundit)”其实根本不了解关键问题所在；同样的，广受欢迎的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在写作科普读物时也不该涉及人工智能问题，因为他并不了解……总之，受人尊敬的专家兼公众知识分子理查德·波斯纳，除了饶有兴致的为最受媒体与观众欢迎的公众知识分子列出排行榜外（亨利·基辛格名列第一），还提出了这样的警告：不要自作聪明，对超出专业范围的议题发言。“很不幸，波斯纳同样没办法证明他是知识分子问题的权威”，拉塞尔·雅克比在《洛杉矶时报书评》上

反唇相讥道。

在1987年出版的著作《最后的知识分子》中，拉塞尔·雅克比表达了对美国知识界的更深的忧虑，即真正的危机是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正在消失，它被专业化程度过高、狭隘的学院专家们取代。雅克比心目中最后一代知识分子是20世纪50年代以丹尼尔·贝尔、加尔布雷斯、特里林为代表的纽约文人圈，他们用优雅、清晰的笔调关注广阔的问题，致力于为有教养的人群写作，而如今的专家们的意见只有少数的同行可以理解。判断知识分子的标准何在，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比法国人班达的定义更具感染力：“他们的本质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的思索中寻求乐趣，简言之，就是寻求拥有非物质方面的利益，因此也在用某种方式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在这个定义之中，所谓公众知识分子或是学院分子，记者还是大学教授这样的角色定义失去了意义。

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丹尼尔·贝尔这样描述现代文化的特性——宫廷乐师、行吟诗人与修道院的僧侣如今变成广告撰稿人、专栏作家与公共形象设计者。被长期拘禁在牢狱中的意大利人安东尼奥·葛兰西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以更开放的心态扩大了知识分子的范畴，除了传统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创造了“有机知识分子”这一名词，它意指伴随商业社会而生的人员，他们可能是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律师，他们的工作更多的是运用智力而非体力，葛兰西在20世纪30年代的判断在今天显得更为准确。彼得·德鲁克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知识型社会，伴随着官僚体制的崩溃，人们越来越从刻板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他们有了更多的自由，而新型的工作也需要更多的激情、创意。刚刚过去的dot-com风潮似乎正暗示了这股新潮流，彼得·圣吉所说的“学习型组织”风靡全球，学习变成了不倦的、终身性的工作，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青年喜欢说“人人都是艺术家”，我们今天是否可以说“人人都是知识分子”。

爱德华·萨义德在BBC电台的里斯讲座上讲道，纯属个人或纯属公众的知识分子都不存在，只要你用文字表达，就意味着进入公众视野。兴趣广泛而优雅的萨义德得出了自由的知识分子定义：“知识分子是以代表艺术为业的个人，不管那是演说、写作、教学或上电视。”约瑟夫·康拉德将文学创作比做黑暗中的救援工作，作家将人们由无意识的黑暗状态中拯救出来。而在班达、雅克比与萨义德心

目中，知识分子则一直在打破日常生活的平庸与乏味，他们的武器是强烈的好奇心，而敌人则是一切循规蹈矩与面目可憎的重复，他们力图赋予暗淡的现实生活以意义。

让我们回到哈耶克与波斯纳的嘲讽，我承认他们的批评都有道理，他们厌恶的是那些未经过思考便盲从既有观念的应声筒。但是，他们的偏激（尤其是波斯纳）妨碍了他们看到更深的危机，知识分子的真正陷阱是沦入过度专业化与技术化的陷阱，失去了对更广阔世界的好奇心，他们不是过度传播新观念，而是对新观念浑然不觉。况且，我们不应该要求每一位活跃思考的知识分子都做出正确的判断，他们最重要的职责是保持不停的思考。

当这场争论跳跃到中国的语境时，我们则面临更加复杂的状况。长期以来，我们将知识分子的角色混同于各种类型的技术专家、工程师、医生，或是社会学教授，只要他们具有专业知识、受过大学教育，他们就是知识分子。但同时我也要承认，将知识分子这一角色过于理想化同样是个错误，一些中国学者顽固地将之塑造成类似索尔仁尼琴那样的异议分子，他们只强调知识分子批判性的一面，却忽略了批判本身并非目的。而当为了批判而批判时，批判本身就成了机械的重复，它失去了知识分子最珍贵的思考与创造精神。

作为在20世纪90年代成长并成熟起来的中国青年来说，他们经历了一个知识分子气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我们是怎样渡过大学时代的——那些陈旧的教材和日复一日被转述的陈腐的知识。我甚至可以不无粗暴地说，90%以上的中国大学生其实从未接触过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我们被教会背诵、服从、考试，而缺乏奇思异想的能力。更多的知识匠人代替了知识分子，他们无力对变化的外部世界做出反应。在转型期必然出现的价值混乱中，我们听不到他们清晰有力的声音。

“大学不再像过去那样受人青睐。”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说，大学不再是知识生产的惟一中心，它拥有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它们是思想库、研究代理商、调查代理商、管理咨询公司和媒体公司等等。而在令拉塞尔·雅克比憧憬不已的美国的知识分子的黄金年代中，很多杰出知识分子是为《时代》、《新共和》这样的杂志工作，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认为学院工作会束缚他们的创造力。而在中国，更尴尬的是，当我们的大学仍未拥有（或恢复）它的知识中心的地位

时，类似思想库、媒体这样的竞争对手也未成熟。思维上的普遍混乱与平庸状态，不断提醒人们，整个社会是多么需要知识分子与他们所代表的气质。或许，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还拥有李泽厚、刘再复，拥有“走向未来丛书”，鼓舞了社会最活跃的阶层更广泛地参与知识或公共事物讨论。

“《时代》对于美国教育的作用大于美国所有教育系统的总和。”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赫钦斯对于亨利·卢斯所创办的杂志的影响力的评价，鼓舞了《经济观察报》的成长与这套《观察家丛书》的出版。我们目睹着中国在过去10年间的高速变化，伴随着各种新观念与名词出现的是深刻的文化断裂感，尽管一个在更广阔的知识背景哺育下的群体正在形成，但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在中国社会同样显著。

《经济观察报》从未将自己人为限制成“一张领导性的商业报纸”，在转型时代，它可能拥有更宽广的胸怀与更富雄心的抱负。我们尊敬专业型媒体，却相信，我们可以做出一些影响更为深远的举动。在将近两年的短暂历史中，我们力图鼓舞鲜活的新知识分子精神的成长，我们将注意力广泛地投注于每一个富于智力性的话题，我们想了解9·11之后世界发生了哪些变化、转型经济学的特别之处、美国如何建立新的霸权、新闻传统发生了哪些变化、科学家们如何看待量子计算机的未来、政治领导人重建世界新秩序的努力、富人应在转型中国扮演什么角色、一家生气勃勃的公司为何会突然“死亡”、文学与艺术是否一直在堕落……我们希望这些探讨建立在对专业知识更为深入了解的基础上，但我们更期待通过这种广泛的讨论来建立起一个供更多的读者思考与参与的平台。我们从不奢望我们的判断一定正确，也不是为所有人而服务的，我们甚至不期待它带有更多的实用色彩，比如教会你怎么炒股票和创办一家公司。我们希望我们与一个有教养的阶层共同成长，这一群体可能是商人、公司管理人员、政府官员、学生、教授或是一个工人，他们知道是好奇心与力图与众不同的热情在驱动这个世界，他们像躲避灾难一样躲避平庸，他们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这个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替的时代，这一点使他们避免沦为僵化分子。

这套丛书的第一辑分为四本，其中《评论中国》和《后9·11世界》是2002年《经济观察报》专栏文章的精选，我们希望这些评论能够激发起你对历史的热忱，

体验到回顾纷繁的历史变迁的乐趣；《转型时代》是“观察家”栏目的集合，它从某个侧面体现了转型中国正在进行的观念变革；《观念的冒险》是在“全球视角”栏目下进行的对世界杰出人物的访谈。我们试图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这个世界到底发生着什么变化，我们该如何应对各种挑战。这四本书（包括这篇序言），都带有明显的令哈耶克唾弃的“在有了些道听途说的科学知识以后，便自封为现代思想的代表……肩负着向公众提供新观念责任的人”的气质。不过，比这种轻蔑更重要的是，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中国自由讨论的气氛。我不喜欢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因为就像我前面得出的结论，只有低级知识分子（知识匠人）与高级知识分子的区别，而没有个体知识分子与公众知识分子的差异。我们也没有试图为我们的角色赋予更崇高的意义，我得承认，有一类人天生就喜欢讨论各种没用的概念，我也承认这种人像任何人一样有对金钱与名声的渴望，即使伟大如埃德蒙·威尔逊也会这样评价他的一位过于单纯的朋友：“他绝不会理解写作也是一件商品，和其他商品一样，如果没有赞助，这商品就得以火爆炒作的方式出售。”我们同样要承认，即使我将《经济观察报》的抱负推向了它并不匹配的地位，我也同意人们通常对新闻业的评价“它天生追逐权力、金钱与戏剧”。但比起这一切弱点，我们最为看中的一点仍是，我们是否鼓舞起你对世界的广泛的兴趣？

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观念的冒险

目 录

总序 重建公共知识分子传统

重思中国经济

胡祖六：重思中国奇迹3

“我们需要更富纲领性的理论来指导下一步改革”，重估20多年来改革的真实成就，切实了解中国在世界所处的位置将成为当务之急。我们需要消除外界对于中国的不合理猜测，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借此清楚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所面临的困境。

诺贝特·瓦尔特：中国改革没有模板15

“尽管面临的挑战还很多，但是中国仍将成为今后20年引领亚洲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诺贝特·瓦尔特在2001年4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提出。……瓦尔特说：“亚洲的一体化——假如这一天会来的话——只能依靠一个成熟、开放的中国。”

热若尔·罗兰：面对不确定的渐进23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里，人们或是为了望眼欲穿的经济复苏迟迟不来而心意彷徨，或是为了某些迹象而大喜过望，甚而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经济走势会是“W”型而不是终究有所指望的“V”型。大众的忍受力和政界、学界精英们的判断力就在这样的等待和折磨中经受考验。

杨小凯：不要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变革33

他从一个局外人的独特角度发表了对中国经济改革热点问题的独到见解，虽然有些批评很刺耳，但是从他的言行中我们能够深切地体会到他的拳拳之心。

王江：用透明规则促进金融创新	43
----------------------	----

一连串的偶然和意外把王江送上了金融学研究的小径。不过，这位物理学博士如今已经走得够远——在麻省理工学院(MIT)斯隆商学院担任教授，并以开创性的研究成果跻身国际顶尖金融学家的行列。

许成钢：改革不应局限于国有部门	53
-----------------------	----

从所有转轨经济的改革看，整体的画面是清楚的，凡是一个国家把改革集中在国有企业上的，这个国家的改革就不太成功。凡是这个国家改革的重点不是放在已有的国有企业上的，这个国家的发展就比较顺利。

开放的观察者

傅高义：中美日，更积极的未来	65
----------------------	----

对于中美日之间如何加强合作，傅高义提出的建议非常易于操作，比如美日间会谈和中美间会谈都应当照会第三方，将亚洲其他国家纳入到开放的中日对话中来，应当讲清楚，这意味着在外交政策中，开放的态度远比桌底下划拳要节约成本。

梅农：跨越误解的海洋	75
------------------	----

盛行于印度的“中国威胁论”和盛行于中国的“印度落后论”都将在加深沟通过程中被纠正，合作的可能性将渐渐凸现于模糊的揣测之上。

里亚兹·汗：不再被忽略的巴基斯坦	87
------------------------	----

他有慈祥柔和的祖父般的外表，但在柔软的浅表之下你很快会触到坚硬的内核。“提问是你们的特权”，他这样说，但他的回答却迂回、反诘、隐喻、赞美、咄咄逼人。

弗兰克·里希特：商业俱乐部的新任务	99
-------------------------	----

和所有面临困境的商业公司一样，世界经济论坛正在试图自我转变，世界经济论坛亚洲主任弗兰克·J·里希特也许是这个转变中的代表形象，年轻、聪明、

精力旺盛、对不同文化保持同样的敏感。

伊丽莎白·伊考诺米：开放的观察者109

也许她对中国的了解还有待加深，但就像她永远过快的语速一样，她飞快地吸收新的事实和观念，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保持开放态度。正是这种开放的态度使她全力主张美国对中国进行政府层面的各项援助，以推进中国的发展变革。

管理的概念

王文京的东方价值观117

我们从王文京那里看到更多的是期待，期待一股潮流，它一定会比WTO这样的贸易规则更持久、更深刻，因为这将是一股生气盎然、充满变革的气氛。它将以罕见的力量推动中国进入现代化，就像它曾经推动欧洲与美国进入现代世界一样。

彼得·圣吉：被误解的预言家129

我们要重新定义组织，它不应再淹没个人；我们要重新定义领导人，他不应高高在上，他只是我们中的一员，一位召集者；我们要重新定义商业，天哪，谁说公司的目的仅仅为了利润，真是混账话，难道它不该关注环境问题？我们要重新定义政府，它要向公司学习效率，但它更应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关怀，更要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积极角色……

柳传志：因为时代在变141

有时，一个偶然的事件成为象征。柳传志被邀请去国际管理科学学会（AOM）2002年年会做《缔造联想：网络的中坚力量》的演讲，正是这样的偶然事件。

李开复：谁主宰微软未来149

离开了研究院的李开复除了仍然把技术当做自己的“最爱”外，更多的时候会走向中国、走向前台。细心的人们发现微软在一任任故事很多、表现难称完美的中国公司首脑旁边，还有一个温文尔雅的李开复和一间对无论是否持有技术报

国梦想的年轻人都有着磁石般吸引力的微软研究院。

姚期智：不可靠的量子计算机159

对量子计算机给未来世界带来的变化，他并没有科幻小说式的预期。就像那些无处不在的粒子，他的大脑总是考虑各种各样的可能，因此对任何预测未来的问题他都不愿做出结论。

约翰·杜纳：艰难时期的领导者171

你需要回到原点，把焦点放到最基本的业务上去，要问自己是什么才能让你获得个人成就。在商业上，答案很简单：把重点放在产品的质量上；把重点放在利润的质量上，你的利润来源是否合理可行；把重点放在你的员工上，你能否带领他们走向成功；把重点放在你的客户上，对于服务性企业来说这是最重要的方面。

顾磊杰：麦肯锡依然故我179

一个成年后才到美国，而且属于少数民族的外来人，竟然成为一家跨国公司的掌门人，这一定是一个很长的、关于坚持的故事。……不过，试图从顾磊杰的话语和表情中寻找故事只能是徒劳，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典型的“麦肯锡人”——缜密的逻辑、严谨的措辞，一切都掩藏在冷峻背后。

重思中国经济



胡祖六

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恢复高考第一年即考入清华大学力学系，后获得工学硕士学位，20世纪80年代中作为公派留学生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员，瑞士日内瓦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与研究部主管。其研究兴趣包括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国际贸易与金融。其研究成果之一——《全球竞争力报告》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

胡祖六：重思中国奇迹

文/许知远 黄一琨 覃里雯

尽管胡祖六并非属于他所景仰的凯恩斯、萨默斯的行列，或许也如他所说很少考虑自己“处于何种历史地位”这样的问题，但他无疑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那股强劲的上升潮流的参与者与引领者之一。

“我们需要更富纲领性的理论来指导下一步改革”，重估20多年来改革的真实成就，切实了解中国在世界所处的位置将成为当务之急。我们需要消除外界对于中国的不合理猜测，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借此清楚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所面临的困境。

39岁的胡祖六是邓小平时代的典型产物。20世纪80年代初的开放热情、乐观精神与社会责任感很容易感染每一个彼时身处大学中的年轻人，“我希望对社会有所贡献”，时至今日，他在高盛投资银行网页上的个人简介这样写道。仍显非常年轻的面孔、浓重的乡音与不无拘谨的神态无不传达着他与那个时代更为相融的气质。“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够引导中国人从一两百年闭关锁国的心态中走出来”，胡祖六在2002年9月回忆说，“（20年前）我第一次走进香格里拉饭店时就像进入另一个世界。”

即使最愚钝的观察者也可以很容易说出从1978年至今中国发生的巨变，威廉·威尔霍尔特1993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准确地表达出这种普遍感受，人们迷恋80~90年代的中国，因为它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一样，在短暂的时间内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人们目睹了一个国家如何卓有成效地进行自我转变。而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之争，使中国的转变更富戏剧感，处于相似状态的前苏联的挫败则加强了这种成功感。

“所谓的渐进式改革或是激进改革，休克疗法都是很形象但又很粗糙的说法，在实践当中是不能截然加以分开的。”胡祖六不喜欢这种笼统的Cliche（陈词滥调），“至少俄罗斯解决了关键的产权问题”。当他在高盛北京办事处接受采访时，A·T·科尔尼咨询公司公布的投资信心调查显示，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投资地区，中国统计局则称2002年中国的GDP有望突破1.3亿美元，它意味着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 000美元。在这两项令人喜悦的数据公布之前几个月，两本畅销一时的英文著作《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与《中国幻梦》嘲讽了“中国奇迹”，前者认定中国的高经济增长掩盖不了内在的矛盾，而后者则讥笑了西方人眼中的“庞大中国市场”的幻觉。而五角大楼2002年7月份的一份报告则相反地认定，中国日渐增长的财富将导致军事上的扩张，并不可避免地导致“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就像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一样，中国仍如18世纪的欧洲思想家所说——“她就是个谜”。每一位观察者都从自身角度出发，以寻找片面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中国的形象是如此矛盾重重，它是即将出现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也可能不过是地区性的二流角色。与巴西差不多，一些人期盼它能恢复昔日雄风，另

一些人则说，表面的成功掩盖不了它真实的虚弱……

如果我们同意吴敬琏所说的“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我们需要更富纲领性的理论来指导下一步改革”，重估20年的改革的真实成就，切实了解中国在世界所处的位置将成为当务之急。我们需要消除外界对于中国的不合理猜测，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借此清楚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所面临的困境。

从这种角度而言，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领导完成的报告《关于中国与世界的五大神话》是迄今关于中国经济成就的最为清晰的总结之一。“中国的经济增长并非前所未有，以亚太地区的标准而言也不见得特别突出。”这份出版于2002年5月的报告指出，尽管过去的23年中，中国的GDP翻了7倍，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标准，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贸易额则跃居世界第6位。但即使如此，中国大陆的经济规模仍只有处于“失落十年”的日本的1/4，而日本的GDP只有美国与欧盟的一半，也小于亚洲七国/地区（韩国、新加坡、台湾、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的GDP总值之和（七国及地区人口数量之和低于中国）。在1970年至2000年间，中国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例由1%上升至4%，GDP的比例从2%增至3.5%。但是，日本和亚洲七国及地区，在30年的高速增长期中，对应的贸易比例都由2%升至8%左右，而GDP比例，日本更是由2%升至10%，亚洲七国及地区由1%升至4%左右。

即使我们深为中国在过去20年中的现代化进程的速度而骄傲，但也无法回避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今天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例为3.5%，仅相当于100年前的一半。“在费正清的一个研究中，20世纪初这个比例是6%~7%”，在采访进行到30分钟时，胡祖六微弱低沉的语调流露出某种焦急与幽默感，“但是我们的人均GDP水平跟一些50年前还在刀耕火种的非洲国家为伍。”这份报告强调，中国经济远非人们惯常想像的那样强大，它没有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甚至也并非亚洲的主宰力量，它更未吞噬亚洲各国的增长空间。“2020年的中国——依然不会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即使基于未来20年的乐观假设，中国也只会成为亚洲地区的主要国家，但在经济上的影响力仍不及发达国家。”这份报告判断道。

但是，就像胡祖六对于世界银行与国家货币基金组织的评价，“是一个催化剂